

文/童弗程

万马如龙出贵州

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的提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黄万机，经过20年对贵州汉文学的研究，5年的编著，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了《贵州汉文学发展史》，洋洋50万字。在大西部开发掀起一个热潮的今天，让人们通过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深切地对源远流长的贵州文化寄予热爱之情，会有助于壮起英雄的胆子，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使贵州的建设能急起直追，如清代礼部尚书李端棻先生为赵以炯中状元所赠联语中的两句话：“忆仙翁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这是会达到目的的。

黄万机第一本关于贵州文化研究的著作《沙滩文化志》，由贵州省志出版，大体介绍了遵义沙滩郑、莫、黎三家人才辈出，著作与功名的情况。以后，出版了《郑珍评传》、《莫友芝传》、《黎庶昌评传》和《文化将军陈沂》；还有《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和参与编写的《贵州明清作家论丛》和主编的《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等。这些著作在省外、国外都产生了影响。日本一位叫石田肇的教授，1999年专程到遵义拜谒黎庶昌的墓，就先函告师大教授张新民君，一定要邀约黄万机同行，“君子以文会友”，结识了黄万机君。

本书目录有综论编、元明诗编、清诗编、近现代诗编、词

编、散文编、小说戏剧编，详征博引，蔚为大观。这本书未面世前，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窥见贵州汉文学的发展脉络的，何况要对诗、词、曲、散文、小说、戏剧多种文学艺术的花朵有所了解。我只能以一千多字来提示这本50万字的著作。希望读者和有心研究贵州汉文学的朋友，自己去看看这本书。让当代的文学艺术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写出无愧于新中国大时代的辉煌著述。

人们常提起贵州的诗是以代表贵州文化的特色。曾国藩赠莫友芝诗有“豪英不地固，十九兴偏邦”句；赵熙《南望》诗有“君看缥渺碁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句；朱彝尊评谢三秀诗有“诗甚清丽，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黔人之轶伦超厚者”；孔尚任评吴中蕃诗“即中原名硕夙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郑珍评周渔璜诗有“国朝二百年，首推桐野翁”句。《贵州汉文学发展史》619页，而诗的论述就占了349页，为全书的一半多。介绍各地各家的诗人群，民族诗人、女诗人将近200个，其中引录的诗也够读者细味欣赏。

很多人尚不知贵州有一本最早的小说《平南传》。原钞本保留在独山烂土长官司张氏后裔张复初手中，民国年间印出，有任可澄作序。又如戏剧有瓮安傅玉书的《鸳鸯镜》、普安任璇的《梅花缘》、安顺黄齐生的《大埠桥头》(近期台湾《贵州文献》已发表)。这一些都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阅读和研究的线索，也开拓了视野。这不过略举一例以窥一般而已。

作者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近年，贵州的苗、水、侗、布依等民族都出版了各自的文学史，惟独汉文学史的研究是块空白。”现在这块白算是填补了。贵州各民族的有一些出色的文士，也用汉文学形式写了不少的文艺作品，就是历史保存的民族古歌，如今也是用汉字译出传播世界的。作者曾有十多万字的客籍文人在野的文学著作，因篇幅有限，暂予删去。希望有一天把它印出来，供诸同好作阅读研究之用。

9-19
南望
绝代经巢第一流
卿人往往讳蛮夷
君看缥渺碁江路
万马如龙出贵州

四川赵熙
赵先生字克生号香宋清
末御史母任心亭之弟
其女拜先生之门学诗

不寻常的模式建构

——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简评

龙建春

(浙江省台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浙江 台州 317000)

贵州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黄万机先生新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贵文史》),为繁花似锦的古代文学园地中增添了一朵奇葩。近期通读《贵文史》,觉得这部 50 万字的宏构,颇有不同寻常的特色。这里着重论述其建构模式。

王钟陵教授认为,文学史编撰要改旧的“复述”式为新的“叙述”式,其关键是史的研究——理论的创造。笔者以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文学史本体的定位,文学史表达的创新和文学史规律的探索,是首要的着手处。

《贵文史》认为:“这里的汉文学,是指以汉语言文字(主要是文言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前言”P1)“文言文”,表明其古典性,“文学作品”则表明文学史本体的确指对象,其文学史的定位也就十分清楚了。正是依据这样的本体观,《贵文学》坚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论述,使人能“把握和体认黔中作家”,明了贵州汉文学的发展概况和特点,进而认识“贵州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文化精神”。(《前言 P4~5》)《贵文史》文学史表达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类型的创新。刘高权先生在其《近期中国文学史与编撰述评》一文中,归纳中国文学史(古代为主)主要有 7 种体例与类型:分类合编体、作家纪传体、作品评价体、史话体、编年体、表解体、典志体。此文发表于 1998 年上半年,其后又出现了几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郭预衡教授主

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作家、文体交错式,大体而言,魏晋以前是“以文体的形式为纬”,其后主要“以作家为纬”,两者结合克服了其本身各自的不足而使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相得益彰;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以分类合编为主而又辅以编年、典志一体,是一种更为完善的新综合式;乔力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则是一种依明显的“史”的脉络,以文体断代、置点连线成片而总合为一的方式,可称之为史体式;《贵文史》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专论史体综合体。全书 7 编 41 章,综论编 4 章,诗歌 3 编 24 章,词曲编 4 章,散文编 7 章,小说戏剧编 2 章。综论编 4 章实际上是 4 个专题,从贵州汉文学发展的背景、分期、特点与风格流派,动因与规律四个方面,对贵州汉文学作了总体的探索与把握,是鸟瞰式的宏观研究。余 6 编以文体为纬,时序为经。文学作品的体裁既是文学作品思想情感的外化形式,又是其体制、风格等的内化形态。解读并研究作品从文学体式入手,更利于体认并把握住作为“历史”的“文学”的本质,进而由文体“史”的脉络来揭示“文学”的“历史”和规律。史体式是微观研究中一种既客观而又简赅的方式。专题——史体式模式,集宏观与微观研究于一体,将“某个作家某一作品所作的单个研究”与“文学史的总体考察”有机融合(丽塔·贝朔尔语),比较客观而准确地获得了对文学自身创作业绩的评估与发展规

律的把握,最易实现文学史编撰的软、硬性目标。

二是方法的创新。《贵文史》采用《内外结合》的横向考察方式,即“从全国文坛的总体风貌及其时代演化的轨迹中来考察黔中作家作品,同时也考察黔中作家作品在全国文坛中的作用与影响”(《前言》P4)。这种方法,极大地拓展了某一地域性文学的生存空间,增大了其容量,更重要的是自建了一个广阔而丰富的参照体系,既有利于进行共时性比较,又为历时性比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共性去寻求个性,并进而为个性在共性中准确定位;区域性文学的个性更鲜明,整个文学的共性更丰富,二者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互生互利效益。《贵文史》对文学史本体——文学作品观照分析时,则采用“多侧面,多视角”的表达方式,即尽量利用中外社科成果,从相邻的学科中撷取切入的视角,从而获取作品所能具有的各个侧面的内涵:应用文艺美学,探讨其内容上的“抒情美”,形式上的“画面美”和“音乐美”,整体上的“意境美”和“风格美”;应用审美心理学,探寻作家创作时的心理动态以及摄取典型、构思框架、提炼文辞过程中的微妙心态;应用丹纳“气候”说艺术哲学,留意发掘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应用社会批评派,探求其反映的时代风貌,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等等。

《贵文史》通过对贵州汉文学发展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其特殊的文学现象,抽象了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其功不可低估。成批而连续的家族性地域性文人集团,是贵州汉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特殊现象。一般来说,家族或地域性文人集团并非贵州一地独有,如汉魏安徽的“三曹”,唐浙江的“三罗”、宋四川之“三苏”,明湖北之“三袁”,清江西之“三魏”,近代湖南曾国藩祖孙三代文人,以及吴中四杰、浙西六家、岭南七子,闽中十子等等,但贵州之“特殊”更鲜明地体现在其时间之长、分布

之广两个方面。论时间,文学家族大多是“三罗”、“三袁”等仅一辈之盛,多至三代如曾氏父子,通常是两代,如“三曹”、“三苏”,日本之藤雪夫父女,法国之“大小仲马”。而贵州则不仅如此,贵阳有《潘氏八世诗》、麻哈(今麻江)《艾氏家集》(集其家9世作品),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多达8至12世,时间延续200余年至300余年之久,这是中外文学史都罕有的。地域性文人集团,以遵义一地最为,起于元明之际,迄于清末民初,几乎贯穿了贵州古典汉文学之始终,时间跨度达七八百年之久,而其他地区大多极盛于一时,如吴中四杰、湘中五子,浙西六家、英国的昆布兰湖畔派,意大利“西西里诗派”,德国施瓦本浪漫派、波斯中古之霍拉桑派,稍长一点的美国芝加哥派亦不过4年,惟古阿拉伯之安达卢西亚派才稍可望其项背,有上百年的历史。贵州汉文学的发展很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时序上,唐以前是“空白”,明代才萌生发展,而高潮却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期——晚清;(二)地域上,集中在贵阳、遵义两地,而以遵义为最;(三)文体上,诗歌最富而成就最高,散文次之,词曲又次,戏曲小说则仅备一体而已。相对其他地区及整个中国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尤为“不平衡”的“特殊”文学现象。最能体现一部地域性文学史实绩的,莫过于对其规律性的揭示,《贵文史》首次科学地揭示概括了贵州汉文学史发展的四大规律:(一)封闭性与开放性互激互补;(二)外因与内因的交互激发;(三)由单一向我样、由低向高的逐层递进;(四)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融与促进。贵州汉文学的这种典型性格,来自于贵州自古即处“天末”的位置,移民和政教的社会文化政策,境内的多民族成分等典型环境。这些结论是精辟的。

总之,《贵文史》为研究贵州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

[责任编辑:李建国]

北京《新时期全国优秀论文集》编辑部、《中国西部新报》杂志社均收录此文。

展夜郎文化 长黔人志气

——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读后

熊作华

(贵州省文史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4)

《幼学琼林》有一句话：“贵州省近蛮方，自古名为黔地。”因此一般人都认为贵州是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继后又出现三无之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一来，贵州就被贬为全国最贫瘠、最落后的地方了，对贵州视为畏途。更有甚者，一些人竟然不知道贵州在何方，闹出了贵州是归昆明管的笑话。由于对贵州的陌生、不了解，所以一些人对贵州和贵州人，往往还带有一种轻视的眼光。

为什么有些人对贵州和贵州人歧视呢？主要是他们不了解贵州，与发达省区比较，自然落后，但也决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哪能凭印象看问题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对贵州缺乏有力的介绍和宣传。万机先生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开了我们的眼界，犹如一次文化仓库大盘点，把我们的存货摆了出来。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可以说是物色各具，五彩缤纷，读了以后，使我们克服了自卑感，顿时觉得我们的先辈也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从而增强了自信心，在文学方面，贵州同样可以立于全国各省区之林，在整个中华民族领域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贵州汉文学，追溯起来，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过词赋家盛览，文学家尹珍，虽然他们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但史有记载。唐宋时期亦有零散篇章流传。明朝贵州建省以后，文学得到了发展，作家与诗人辈出，到清末为止，五百年间，贵州的诗词古文收集近九百部，流传至今的也有四百余部，作者近六百人。另外游宦、游幕、游历入黔的文人，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徐宏祖（霞客）有《黔游日记》、清代著名诗人赵翼在贵州的诗作就有五百多首。王阳明的诗《居夷集》和一些散文都是贬至贵州期间所写的。以外如田雯、张澍等还写有《黔书》、《续黔书》等多部文集。这些省籍和客籍文人的文学作品，组成了贵州丰富多彩的汉文学。可惜这些瑰宝却一向少为人知。万机先生这次把它清理出来，展示出来，对介绍和宣传贵州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贵州汉文学中，以诗歌最为突出，历代出了不少杰出诗人。如明末的何腾蛟，拒绝清军的招降，不屈殉国，大义凛然，为人称赞。其《绝命词》有“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家周”诗句，发出未能挽救明朝的哀叹。谢三秀是明代贵州最杰出的诗人，影响极大，他的诗如实地反映了时代风貌，与鼎鼎大名的戏剧家汤显祖及一些名流，多有往还，友谊极深。此外如越其杰、杨文骢（龙友）等，都是有名诗人。特别是杨文骢，不仅诗书画均有造诣，而且是抗清名人。孔尚仁一出《桃花扇》，使杨龙友名扬海内。此外，明清易代，义不仕清的一些诗人，如陈启相、钱邦芭、吴中蕃等的诗，也各具特色。有清一代，贵州的诗人就更多了，如周渔璜、丁宝楨等，名气最大的当推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了。功勋显赫的曾国藩对莫友芝就非常推崇。他俩在北京书肆订交以后，一直视为知己。曾国藩赠莫友芝的长诗中有“黔南莫夫子，志年无匹双”句，莫友芝死后，曾国藩时为两江总督，亲率百官到莫愁湖祭奠，其挽联为：“京华一见便倾心，当时书肆论交，早钦夙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尊和泪，来吊诗人。”足见他对贵州人并不轻视。

万机先生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历时五年，搜集了大量资料，可谓夙夜匪懈，呕心沥血，将贵州历代文人，特别是诗人，顺时梳理，并选录代表作，加以客观的评论，是《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书》、《续黔书》等前人著作之后的又一重大贡献，值得关心贵州文化者一读。

黃萬機與《貴州漢文學發展史》

龐思純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紙空。」陳福桐老先生常常告誡我：做學問切忌浮躁和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要下苦功夫，這樣才能功底紮實，學有成就。陳老以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黃萬機先生為例，說他浸淫於古典文學和歷史文獻二十多年，在浩若煙海的舊籍堆中採擷鉤沉，研究解讀，直至「天命之年」才大放異彩，先後推出文史力作多部，以驕人之成績名揚黔中，成為當今貴州頗有影響和實力的學人之一。

當時我剛涉獵文史，與黃萬機先生從未見過面，對這位已成名的學者僅是欽慕而已，盼望早日識荆。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紀念丁寶楨誕辰一百八十週年暨學術研討會」在貴陽隆重展開，經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林建曾的介紹，我終於結識了黃萬機先生。萬機先生給我的初步印象是樸實無華，謙和有禮，毫無時下一些「名人」那種傲慢矜持、故作高深的作風。之後，我在不同的場合見到過萬機先生，對他的學識人格有了較深的瞭解。

萬機先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誕生於遵義東鄉的一個舊知識份子家庭。他家距「沙灘文化」的搖籃——黎氏沙灘村落僅十多里。孩提時代，萬機常聽到祖父談到沙灘的三位先賢鄭珍、莫友芝和「黎四大人」（庶昌），談到他們的才華事蹟，也隨長輩去過沙灘探幽訪古，尋覓鄭、莫、

黎三位先賢的流風遺韻。美麗的樂安江，江上的石磯、水車和小渡船，江畔的垂柳和垂釣老人，以及附近蒼松翠柏的馮門山，山上殿堂高聳的馮門寺，這一幅幅美麗的畫面，在萬機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慢慢形成了一種解不開、剪不斷的戀鄉情結。正是這種情結在他心中萌生了要像先賢那樣去成就一番事業的志向。

萬機從小聰慧好學，過目成誦，喜愛古典文學，愛動筆桿子，在遵義師範就讀時就有「活字典」和「神童」之稱，兼之喜愛音樂戲劇，拉得一手好二胡，因此頗受師生矚目。遵師畢業後，萬機被分配到思南工作，先後在小學和中學任教達六年之久。在此期間，萬機教學之餘，從事文藝創作，曾發表歌曲《回家家》和《我愛你嘍，清水江》，二胡獨奏曲《賽龍舟》，創作過未發表的電影文學劇本《岳飛》和《鄭成功》，顯示其文藝的才華。一九六二年，由於思南中學教師隊伍調整，危及到萬機的工作，於是他憤然報考大學，被貴州大學中文系錄取。讀書期間，萬機潛心攻讀古典文學，準備畢業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誰知「文革」爆發，萬機的美夢又被粉碎，一九六八年他被分配到江口縣從事群眾文藝的工作，直至一九七九年才結束。「四人幫」覆亡後，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屆中年的萬機懷著熱情報考了七九年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班，因成績優秀而被錄取。

兒時的夢想，多年來憧憬的研究事業，沒想到在不惑之年實現了。為此，萬機十分珍惜這次機遇，更深深地熱愛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給自己力量和靈感的黔中大地，他以無比的熱情和百折不撓的決心投入古典文學及貴州歷史文獻的研究中，把視點始終放在明清以來的貴州先賢以及對黔中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客籍文人身上。他不問仕途，不問經濟，長年泡在典籍文獻中，面壁苦讀，鉤沉探微，心甘情願坐冷板凳，紮紮實實下苦功夫。他之所以能這樣頑強地堅持下去，照萬機的話來說：「一是要像鄭、莫、黎三位先賢那樣成就一番事業；一是自己心中始終有一種揮不去、抹不掉的濃郁鄉情，時刻驅使著他去完成兒時的美夢。」正是這種執著的追求和奮鬥不息的精神，終於使萬機的心血開花結果：自一九八六年出版《沙灘文化誌》後，萬機文思如湧，一發不可收拾，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間，相繼推出《鄭珍評傳》、《黎庶昌評傳》、《周漁璣年譜》、《莫友芝評傳》、《客籍文人與貴州文化》、《莫友芝年譜》，以及傳記文學《普通一兵——記「文化將軍」陳沂》，並發表一百五十多篇學術論文，編纂了多部文學、史學著作，參寫了《遵義縣誌》和《遵義市誌》，點校了古籍五種，發表文史普及讀物四種二百餘篇，可謂著述甚豐，碩果纍纍。值得一提的是，萬機有一個賢內助。其妻杜瓊瓊賢慧勤勞，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使萬機沒有後顧之憂而潛心治學，自己將家務全包攬下來，創造了一個治學的好環境。

萬機的研究成果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郭延禮先生（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在上海《文匯讀書週報》撰文《讀近代貴州籍三作家評傳》時稱「三評傳」：「材料豐富，翔實可信，論述精闢，時有新見」。湖南省湘潭大學把鄭、莫、黎三評傳採作研究生教材。日本東京群馬大學石田肇教授是研究黎庶昌的名家。一九九九年秋，石田肇特地從日本前來遵義沙灘考察黎庶昌故居。萬機和張新民先生在貴陽機場接機時，石田肇稱萬機為「全方位的一流學者」。萬機因著述優秀，曾多次榮獲國家及省級的社會科學獎。

萬機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二〇〇〇年冬季，他又給黔中父老一個驚喜，獻上了他的新作《貴州漢文學發展史》，從而填補了貴州漢文學的空白。萬機告訴我，這部五十萬字的著作，寫作達五年之久，但準備的時間卻有二十多年。自古以來，貴州被視為「蠻夷之地」，毫無文化可言，萬機這部著作的問世，完全消除了一些人的偏見和謬誤，從而向世人昭示：地處「天末」的貴州並非「文化沙漠」，而是自古以來文人輩出，群星璀璨；黔中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分支，是其延伸和補充。其特徵具有「大山大性格」……

該書給我的總體印象是：史料宏富，對明清以來的貴州詩家、文人的生平、流派、風格介紹詳細，但詳略得當；持論公允，薈萃前人及今人對貴州詩人、散文家的評價，讓讀者自行判斷；可讀性強，文字輕鬆、毫無生澀之感，既可當工具書用，又可作文藝作品讀。

談到史料宏富，萬機對貴州歷史上在文壇有成就的人

物均有介紹，一些重要人物如孫應鰲、謝三秀、越其傑、楊文驄、吳中蕃、周漁璜、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詩文名家，均闢專章評述，這就給讀者一個明晰的印象：這些貴州先賢不僅是黔人的驕傲，而且是華夏文化的佼佼。然而萬機並不以此忽略其他作家，如元明清時期的各地詩人群，均分期介紹。女詩人也闢有專章，給人一網打盡的感覺。看到貴州文壇歷史上出了這麼多英才，筆者不禁想到清代詩人趙熙對鄭珍《巢經巢詩集》所評價的《南望》詩：「絕代經巢第一流，鄉人往往諱蠻陬。君看縹緲蒼江路，萬馬如龍出貴州。」此詩說得不錯，的確在明清兩代，貴州的無數英才「萬馬如龍出貴州」，到中原縱橫馳騁，展現才華，為黔中父老爭光，為華夏文壇生色，為貴州的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令人驚喜的是，萬機給我們提供了貴州古代珍貴的小說史料。古典小說的創作，歷來是貴州文學的弱項，影響大者尤為罕見。萬機從眾多的典籍文獻中鉤沉出《平南傳》、《夢餘筆談》和《啖影集》實屬不易。從這三部小說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原文化的影響。

《平南傳》是明代無名氏的作品，記載的是獨山「爛士長官司始封張公及諸子平定滇黔之別錄」。講述了自明太祖登基大封群臣至永樂年間平定思州叛亂的故事。內容力求傳奇性與真實性有機的結合，我們從中不難發現有《水滸》和《三國演義》的痕跡。

《夢餘筆談》是沙灘文化的創始人黎安理的作品。內容怪誕奇詭，駭人聽聞，洋溢著仙道神佛的氣息，使讀者

踐，在貴州戲劇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自古以來，文學評論見仁見智，褒貶不一。然而萬機跳出了前人的巢臼，採取客觀公允的態度，將歷代有代表性的評論呈現在讀者面前，讓其比較，以辨優劣。如清初貴州詩家周漁璜被時流所推崇，有「力持風雅，領導群彥」之美譽，其流風餘韻直接影響到晚清的詩人鄭珍、莫友芝、陳田等人。然而在當代，周氏之名被排斥於全國文學史及詩史中，這不得不令人困惑和深思：是政治偏見在作祟吧？又如對鄭珍的評價也令人愾氣。清代散文家吳敏樹會高度評價鄭珍曰：「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為本朝人所無。」才華絕世的郁達夫對鄭珍的詩情有獨鍾，認為其「治許鄭之學，精『三禮』，故為文有根底；詩近蘇黃，而不規規肖仿古人。」當代名家錢仲聯對鄭珍的詩有如此讚譽：「清詩三百載，王氣在夜郎。」遺憾的是，鄭珍這位對晚清詩壇影響甚深、被譽為「清代冠冕」的名詩人，卻在新中國的文學史中遭到不公平的評價，一些文學史將其列為「宋詩派」代表人物，總體評價明顯頗低。然而對自己喜愛的作家，萬機不僅著筆甚多，對其藝術特色，文化內涵作詳盡深入的分析，而且對其頗帶感情。如對「人奇遇奇，故文特有奇氣」，有著「堅強之氣」的桐城派散文家黎庶昌就筆端帶有感情，認為其「在近代文壇上有相當的地位和影響」，是「維新變法的先驅」，其散文具有「雄肆華瞻」之藝術風格。

萬機植根於貴州文史園地二十多年，默默耕耘，不畏艱辛，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讓我們摸清了貴州

想到，可能作者面對現實的威壓，不堪重負而幻想桃源似的避亂去處的精神寄託。

《啖影集》係乾嘉年間范興榮所作。這部小說受《聊齋誌異》影響甚深，記述了社會中的奇聞怪事，或借鬼神狐兔的行藏戀愛而影射現實，並加以批評；或揭露官府貪贓枉法，坑害百姓；或暴露科場舞弊，抨擊社會黑暗現實。雖然這是貴州文學中僅存的三部小說，然而它卻給我們勾畫出貴州古代小說創作的一個側面，對我們瞭解當時社會生活不無裨益。

在《貴州文學發展史》中，萬機對貴州戲劇史也有系統的評述，並選出三部戲劇。早在乾隆年間，貴州詩人傅玉書就創作了《鴛鴦鏡》傳奇。故事以明朝忠臣楊連和左光斗反對宦逆魏忠賢而慘遭殺害及史可法入獄探師（左光斗）為背景，講述了楊連之子楊忠嗣歷經磨難，萬里尋母，為母伸冤，最終成為狀元，與左光斗之女左湘雲終成眷屬的曲折經歷。故事感人至深，情節跌宕起伏，戲劇性強。

而任璇（一七四五—？）的《梅花緣》，敘述了秀才王廷睿與大家閨秀方素梅之間生死離合的愛情故事。這部傳奇，表現了「情」與「理」的鬥爭，具有反封建的積極因素。

新編歷史川劇《大埠橋頭》是清末民初黃齊生所創作，內容以明末民族英雄何騰蛟抗清殉國的史實為題材，塑造了一位剛強不屈、正氣凜然的民族英雄形象。這部新編歷史劇的誕生，標誌著貴州人改革傳統戲劇的首次實

漢文學的家底，為那些有志於研究貴州漢文學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給他們指明了研究方向。如今萬機又在醞釀新作，願他筆耕順利，再結碩果。

★（上接第七十四頁）（二〇〇〇年六月五日）

①（見《李白夜郎》）（《神奇貴州》一一一頁）；《開發貴州的詩資源》（《貼著窗兒》四四二頁）等文。

②參見羅強烈：《貴州現象啓示錄》，人民美術出版社九三年五月版。

③必須說明：這些封閉文化形態也是通過「外向衝動」才引起外界注意的，如貴州蠟染、安順地戲到國外表演，赴首都北京搞貴州溶洞展、侗族鼓樓展等等。對貴州這等天生麗質、養在深閨的珍寶，張克強調說：「我深感兩條：一是要開發到實用才能顯出其價值；二是宣傳的作用，要宣傳才能為外界所認識。」（《不解的白水緣·山水與酒》三十九頁；貴州人民出版社九六年三月版）。

④《那方山水那方人·記老海》（《不解的白水緣》三三四頁）。⑤這裡還涉及張克在《從「洞展」到「侗展」》一文中談到的一個問題：即「珍貴」（獨特的民族風情）與「落後」的矛盾，在貴州少數民族生活中「一比皆是」。張克認為，這個問題也必須通過「開放」才能解決：「只要經濟搞活了，對外開放了，群眾會把許多拔尖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遺產保留下來，而把大量存在的落後的東西逐步取代下去。」（《貴州真山真水行》二五六頁）。

⑥張克：《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圖書》（《貼著窗兒》四八五頁）。

（本文原載《貴州社會科學》九八年一期，此稿重新作了修改和補充。）